

【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】

十七年

seventeen
years
old

田中禾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十七岁

sevent
years
old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七岁 / 田中禾著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4046-5

I. ①十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0956 号

- 书 名 十七岁
著 者 田中禾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胡 泊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250 千
印 张 18.75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,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46-5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3月13日(甲子年二月十一)星期二 阴 小雨

客人们都走了。院里的鞭炮纸屑和烧纸残片已经清扫干净。三位乡下来的堂姐在地铺上安歇，她们在等待明日按规矩去给母亲圆坟。只有亲族的丧事，老姐妹们才会撇开各自繁琐的家务聚在一起，夜晚同睡一床，像小时候那样喊喊喳喳彻夜不眠，给失去亲人的家庭带来亲情温暖，冲淡丧事之后的悲伤。明天是母亲下葬第三天，姐姐们要一齐动手包饺子。把饺子煮好，用木桶挑到坟地上，在坟前摆上四个菜，洒上三杯酒。男人们挑来黄土把第一天埋下的坟堆添高，堆圆，砌一块带草根的圆形土块做成坟帽，放在坟头上。姑娘们捧上一捧土添在新鲜的黄土堆上，算是和亲人做最后的诀别。

两天阴雨，半夜时分小院上空荡开了稀朗的星光，深沉的夜色平和安详地笼罩着故乡县城。母亲真的永远离开我了吗？不再伴我生活，不再给我爱抚，不再给我教诲？如果我在人世受了委屈，有了心事，我还能去对谁诉说？如果我犯了过失，做了错事，谁还能给我原谅，给我安慰？此时此刻我才明白，从此以后我要独立承受人世降临的一切，我真的要做大人了。在甲子年二月初七这天之前，我并不知道人世究竟是什么。母亲离开我的时候世界还像往日一样，可我知道往日已经不复存在。

目 录

日记一则·····	1
1 木匠的女儿 ·····	1
2 外祖父的棺材和外祖母的驴子·····	17
3 十七岁的杂货店小姐·····	34
4 1944 年的枣和谷子 ·····	52
5 张二嫂和她的孩子们·····	72
6 六姑娘十七岁·····	92
7 少年远行 ·····	109
8 鼠年的疥疮 ·····	155
9 进步的田琴 ·····	175
10 模糊·····	192
11 葬礼与爱情·····	211
12 乡下妞春梅·····	229
13 诗人的诞生·····	248
14 飞吧,忧伤的小鸟 ·····	269

1 木匠的女儿

我没法想象母亲年轻时的模样，但我知道在牌坊街人们的眼里，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。最早发现这一点，是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我的同学以“洋马”这个外号戏谑我，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影射我的母亲，我和他们打了一架。可是从那时起，我知道了母亲高高的身材在牌坊街是引人注目的。我发现没有谁的母亲能如我母亲那样引起牌坊街孩子和大人的关注。和母亲一起走过大街，我能感觉到店铺门廊里投射出的目光，感觉到人们脸上浮现出的善意或恶意的微笑。母亲的身影用骄矜、自若笼罩着我，我仿佛听见人们发出的羡慕：瞧这女人！瞧这孩子！在这样的感觉中长大，我无法想象人的一生除了骄矜、自若，还会有别的什么心态。直到母亲的晚年，和年近八十的母亲一起上街，我仍能感到自尊心的满足，如孩提时一样沉浸在骄矜、自若的喜悦里，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个落魄回乡、寓身市井、身份灰色的无业游民；二哥还在边疆劳动改造，尚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。母亲衣着整洁，持杖款行，一边回应熟人们发出的亲切招呼，一边领受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的目光。我依然仿佛听到人们心里发出的赞叹：瞧这老太太！瞧她的儿子！和母亲在一起，我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得格外欢畅，倨傲的秉性也特别令我得意。从小学到大学，到母亲的晚年，她常责骂我“骄傲！你个骄傲的东西！”在我听来，母亲的责斥更像是赞赏和夸耀。

我想象着民国十二年的一天，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从前的日子。一个年轻媳妇出现在城东三里文峰塔下的土地上，在金黄色的谷田里

弯腰收割。当她直起身擦汗的时候，沟对面地里的男男女女全都扭过脸来盯着她的身影。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望着她哧笑，瞧啊！老二家的新媳妇下地了！母亲身穿士林蓝短褂，黑裤子，虽然按当时的风俗把浓密的黑发在脑后挽起了发髻，但那稚嫩、润泽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睛，看起来仍然像个玩心未退的女孩。

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，老家经常诱发着我的想象。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的从前，有一帮灾民，担着担子，推着手推车，携家带小，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座县城。他们走出南门，越过城河，走过一座石碑搭起的小桥。向东望去，一道丘陵的影子隆起在东方天宇，丘陵上耸立着一座九层砖塔。沿着长满野草的土路走上冈坡，脚下是一片沟壑隔断的荒野。这些外乡人在这外乡的荒坡里住下来，盖起房屋，种下树木，打下水井，搭起鸡舍、牛棚。文峰塔下有了炊烟，有了呼儿唤女的声音。他们操着和本地人不同的口音，在周围庄园里干活。人们把这地方叫做“侂子营”。也许这些被当地人称为侂子的人就是我的先祖，也许在某一次变迁中，我的先祖从侂子们手中把这座庄园变成了自己的产业。这一切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，由于母亲的到来，它成了我的老家。这很自然，也很奇怪。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我不断被这个问题困扰，不明白我的生命和侂子营是怎样被联系在一起的？如果不是南阁街姓田的木匠去世，他的女儿正当婚龄没找到婆家；如果不是因为牌坊街的灯笼匠答应给我的外祖母买头驴子，我母亲这个木匠的女儿就不会嫁给他，侂子营对于我也就毫不相干，我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小村；这小村也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我这个人。侂子营变成我生命中的一个世界，完全是因为外祖父去世了，外祖母需要一头驴子。外祖母有了一头驴，舅父、舅母就能继续开他们的磨房，继续卖蒸馍。我母亲为了换这头驴，嫁给了牌坊街的灯笼匠，灯笼匠出生在侂子营张家，我就成了张家的后代，我的孩子们也成了张家的后代，侂子营对于我和我的孩子，不再是地球上的一个普通的村庄，它成了我的家族血脉的渊源。

后来母亲告诉我，沟对面的村子叫“城拐角”，它是我的姥姥家，我姥爷的弟兄的子孙们仍然住在那儿。“城拐角”这个村名于是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。是某种神秘的力量使牌坊街的一个孩子和城

外这两个村庄联系在一起。无论出东门还是出南门，只要走出县城，就会看见一抹灰黑色的影子贴在城东冈坡上，像天地间的一片云彩。站在村头回望县城，巍峨的城墙从两个方向蜿蜒而来，交会成一个巨大的拐角。“城拐角”和“侏子营”隔一条大路，冈上冈下相望，和文峰塔构成三角。两村的土地隔一条荒沟。干活歇息的时候，姥姥家“城拐角”的人和老家“侏子营”的人凑在一起，脱下一只鞋子，垫在屁股下，坐在沟边抽烟说话。说谁家的老人病了；谁家新添了孩子；谁家的媳妇和婆母闹了什么纠纷。有了红白喜事，两村的人都要互相通知。这平常的农村风景，因为一头驴，和我的生命景象交织在一起。我既然做了张家的后代，张家祖上的故事也必然进入我童蒙未开的儿时记忆。

我不知道黄学的石碑上是不是真有我姥爷的名字，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曾经找到过那通石碑，它就在先叫初级师范后叫第四中学的校门外，那上面确有张凤吾这三个字。有时候又对这三个字是不是我姥爷感到疑惑。如果这个张凤吾不是我的姥爷，有没有这通石碑，碑上有没有这个名字，对我也就无关紧要。然而父辈和兄长们言之凿凿，说我姥爷确是本县最后一次乡试的秀才。如果不废科举，也许我家也能如西关的曲八老一样在门前竖一座铁旗杆。所以，他们有理由痛恨无事生非的罗六爷——一个与我家毫不沾边的人，影响了我家的家族史。他住在离城七十里的偏远乡村，自己是前清举人，却跑到城里来多管闲事，纠集一伙人把洋人的教堂给砸了，害得全城乡按户摊派教捐，赔偿洋人的损失。27000两银子固然不是小数，停止本县文、武科举考试五年的处罚，可让父老乡亲们伤透了脑筋，这处罚实在太严重了，它等于抽撤了全县莘莘学子成龙上天之梯，使家乡的有志之士丧失了做大清贤臣的最后机会。那次停考后不久，科举就被废除，读论语、孟子的人再也无法做秀才，更不要说举人、进士。这桩发生在光绪年间的公案，断送了我姥爷的前程，影响到张家的门楣。一个耕读持家的家族，从此心灰意冷，“读书还有啥用啊？”

父亲最先觉悟，他不再如祖父那样留恋“之乎者也”，他去向一个大字不识的远亲学手艺，及早成为牌坊街的灯笼匠，变为县城的市民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张家的晚辈们甚至连初中、小学都觉得多余，“认

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。”他们当中更明白一些的干脆一个字也不要认，“不识字多省心！打右派、查反动标语，这类事再也摊不到头上来。”我猜想我的先辈早已认同这种认识，所以没给我们留下家谱、契约、证件、纪录之类任何见诸文字的负累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佑护了后代，不至于给张家大多数族人的光彩身份添麻烦。礼仪上带来一点小小的混乱，有谁会计较它？我的堂兄把他的几个儿子取名叫学×、学×，母亲诧异地说，你爷爷叫张学义，你儿子叫张学×，和他姥爷排一个字牌？堂兄淡然一笑，“起名字不过是在生产队的记工本上有个记号，认那么真干啥？”母亲笑了，她不得不承认堂兄的话自有他的道理。那些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晚辈，大妮、小妮、大娃、二娃……嘴里叫得飞熟，谁能记得他们的名字？母亲去世的时候，许多熟悉的亲族来吊祭，事后那些记在吊唁簿上的名字显得陌生而荒谬，我竟没法把他们与现实中对的人对照起来。这使我明白了文字的符号作用其实也微乎其微，文字如果不被识字的人当做进身、勾斗的武器，那也不过是没事找事折腾自己和别人多余的精力，用来满足虚荣心和优越感罢了。从前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张家子孙因为不读书、不识字而保持了混蒙本色，对身历的乱世浑然不觉，连“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”的人生哲学也不需要，就如鲁迅所说，种田就种田，舂米就舂米，因而保持了家族的人丁兴旺，太平安乐。

我猜想母亲初嫁佟子营的时候，日子是平静、安逸的。她经常在这条县城通往小村的土路上往返。有时跟在父亲身后，有时独自一人。后来是抱着或背着孩子，再后来，有女孩和男孩在她身前身后跑动。他们在铁轮车的辙印间奔跑，追逐草丛中飞起的蚱蜢。庄稼发出沙沙的喧响，蚰子在豆叶下起劲鸣噪。大路向坡顶绕出一个漫弯，走上冈，看见村边的小树林，像灰色纱幕，掩映着黄土墙和黑房顶。一条肥大的黄狗从林子后窜出来，摇着尾巴，绕着人的两腿，唧唧啾啾扑上扑下，用滴落口水的舌头亲热地舔逗母亲的手脚。母亲一边呵叱一边抚弄它光滑宜人的皮毛。大黄狗一直这样绕前绕后地蹿跳着把他们引进院子。父辈生活的院子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大院，倚着坡势从堂屋向大门倾斜。院门口像所有农家一样，有一口泛着泡沫的沤粪池，池里浸泡着牛粪和

柴草，空中飞舞着雾一般的蜚虫。站在大门口，情不自禁地被不远处的池塘吸引。它清澈，明亮，水面上漂浮着墨绿的荷叶，小树和灌木的倒影在岸边浮动。我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箩筐里压上馒头，放上几块断砖，把它沉进塘去，过一阵提上来，就会有鱼虾在筐底蹦跳。挨着大门是一间储放牛草的仓房，我经常和堂兄们在这儿捉迷藏。甬路左边有一台石碾，岁月在发灰的石头上布满星星点点的麻坑。和大门相连的东屋是牛屋和磨房，门口有一棵老枣树，一到秋天就闪烁着惹人眼馋的星星似的红枣。北屋是叔父们居住的厢房。婶母用铁面盆打来一盆水，泡上一块家织布方巾。母亲一边洗脸一边和婶母说话，城里乡下的琐事使她们喋喋不休。

母亲很喜欢乡下，这种感情一直传延到我的儿子。我因此为我的孙子以后的后人担忧，没有一个可以怀恋、追忆的乡村老家，他们的记忆世界会不会变得枯燥、乏味？尽管岁月流逝，老家变得面目全非、旧景不再，使人伤感，可它深印入我童年的心中，成为属于自己独有的永远不会破灭的童话世界，在冗烦的人生途中，不断唤起我的念想和温情。和母亲一起在乡下度过的麦收季节的印象，至今仍然在我心中激发着湿润、美丽和辽远的怀想。

在那样的季节，一家老小总是天不亮就起床。星星在天顶闪耀，晨风中流溢着成熟的麦田的气息，咳嗽、说话和狗的跑动声从黑暗中传来。“吃杯茶”掠过头顶，在天空响亮地鸣叫，吃一杯一茶！吃杯一茶！随着麦叶和镰刀嚓嚓的响声，白白的麦田被分割出一道道黑色的斑块，斑块不断扩大，逐渐连成一片。第一缕霞光抹亮天际，人们仿佛才从梦境中醒来。裤脚被露水湿透，鞋子变成泥坨。妯娌们显露出各自的身形和面目，停下手中镰刀，用刁钻的话斗嘴、开玩笑。太阳冒出地平线，轮到下厨的媳妇提前收工，镰刀夹在腋下，沿着田边小路向村子走。炊烟从雾腾腾的林子背后升起，在初升的阳光里飘散。

收完庄稼，母亲重新出现在牌坊街。身边多了一个年轻女人，灯笼匠的买卖显得更加兴旺。他不必像从前那样，来了顾客就得放下手里活儿去招呼，现在他可以一边和顾客笑模悠悠应酬，一边继续干他的活儿，母亲会去照应买主。这个在牌坊街初见市面的小媳妇，说话爽朗，

语气诚恳，三言两语就能让顾客轻松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乐意听她为他们出主意。如果有谁想要一耍小聪明，故意用出格的价钱和她搞价，她会噘起脸，把东西从买主手中拿过来，摆好在货摊上，挥一下手说，你到别处去吧。

灯笼匠的货摊渐渐变得琳琅繁复，出现了锄头、铁锹、牛缰绳，树皮碾成的治棉虫的大药，山里来的染衣服的橡子壳，藤条编成的鞭杆……一进腊月，父亲和母亲就连明彻夜做活儿，灯笼、箴篱堆满半间屋子。过了二十三，各家商店把货物摆出门外，过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，牌坊街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。父亲、母亲在货摊前忙碌，直到集市散去，才顾得上吃饭。

在我出世之前，我的姐姐、哥哥们选择了不同的时机，来到这个充满生机和罪恶、不断编织着故事的花花世界。

我大姐出生在虎年，她选择了学生们上街游行的时刻。收生婆把她递到母亲怀里的时候，一帮学生正把隔壁京货铺里的东西拿到街上去焚烧。外祖母以为是土匪杆子进了城。父亲说，没事，这是学生们查抄日货哩，咱这儿又没日货。外祖母把我大姐抱起来，亲亲她的脸蛋说，长大了可别跟他们学，到街上去惹是生非。

我二姐选择了民国十九年。她还在襁褓里，母亲经历了与外祖母第一次看见捻军相似的情景。县城被一支莫名其妙的队伍占领。他们穿着破旧的长衫、小褂，露宿在街边屋檐下，用湖北蛮子的口音向牌坊街商户派饭，“一席，两席。”他们伸出手指，向人们比画。母亲做了一瓦盆粉浆面条，炒了半盆豆芽菜，端出门外，让他们围聚在屋檐下吃。吃完饭，他们留下了两张自己印制的米票，虽然这米票没地方去兑付，城里人仍然对这支队伍感到不可思议，既然他们手里拿着枪，为什么不去抢砸店铺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人都是贱货？你对他们越凶狠，他们越怕你、敬你；你对他们越和气，他们越瞧不起你，欺侮你。这支队伍离开县城的时候，商会自卫团的人把两个掉队的病号抓起来，交给了国民兵团十六师，五花大绑游街示众，然后枪毙在南门外的乱葬冈里。我不知道这两个已经难以找到尸骨的外乡人，现在是不是被追认为烈士？牌坊街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这支唤起他们怜悯心的队伍几十年后

能够夺取中国政权。红二十六军路过县城的故事早已被牌坊街的人们淡忘，投奔这支队伍的吴老师也早已战死他乡，只有他那个小脚老伴还住在南门大街的小巷里，证明着这段历史的存在。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，腰背有些伛偻，白发有些稀落。1968年曾经被红卫兵簇拥着热闹过一阵，现在已经不再被人提起。吴老师被迫认为烈士，牌坊街的人们私下里对他还是颇有微词，一个中学校长干得好好的，偏要去投红军，把一个贞节贤良的女人扔在世上，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地过了一生。

我大哥来到世上不久，崔二蛋的杆子打进县城，在城里驻扎了十几天。土匪过后，城里瘟疫流行，死了很多人。可是我家并没遭受太大的损失。三叔赶来一辆大车，所有的货物、细软加上母亲和孩子，一车拉走，在乡下躲避了不少日子。有一位庙里的道士，给人们散发一种连根带叶的植物，让大家煮汤喝。我大哥就躲过了瘟疫，长成一个泼壮的男孩。

也许我二哥来到世上的时间不合时宜，因而命途多舛。他从小爱生病，一生不断受命运捉弄。我用周易、八卦和四柱算命术为他推算过多次，结果还是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。他降生在狗年九月九日，秋高马肥，高粱、谷子都已成熟，芝麻、绿豆正在开花，看不出任何不吉利的征兆。那一年市面平静，既没闹土匪，也没过红军，也没有灾荒饥馑。父母亲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他们买下了一处院落。它坐落在全城最繁华的大牌坊和西城门之间，临街两间铺面，连着一个由厢房和堂屋组成的筒子小院。它本来是城里有名的绸缎庄，业主染上了鸦片烟瘾，生意被抽光了，当他需要鸦片的时候，我父亲需要房子，这所已经破败的宅院被我父亲典当过来。当期到了，破产的绸缎庄老板继续需要鸦片，双方签下转卖契约，我父亲补给他一笔钱，这所房产的业主就成了“张福祥”。我母亲请庆记的账房先生为店铺郑重其事取了名，“永聚祥”铁器杂货店，成为西门里的一家商号。

我出世前的几年，“永聚祥”杂货店在牌坊街已小有名气，虽然灯笼、灯笼仍然是父母亲的看家手艺，“灯笼匠”这个称呼却早已被人淡忘。人们按照我父亲在弟兄中的排行，称他为“二掌柜”。过了五十岁的父亲已经开始发福，大哥、二哥经常在他突起的肚子上玩耍，把他的

肩膀和脑袋当做攀爬的山峦。我母亲不再是一个傲气的女孩，她的发髻显得更加整齐，眼睛里透出几分睿智和威严，“永聚祥”的内掌柜在货栈、商行之间周旋，有时到码头去接货，有时代替我父亲出席商家邀约的聚会，脸上带着和悦持重的笑容，对街坊熟人的玩笑应付自如。走过大街，不断有人和她打招呼、开玩笑。

最令父亲骄傲的是我的大姐，她已经长成牌坊街出众的女孩。朝阳初升的时分，街两边的店铺刚刚打开栅板门，店里的人都会看到“永聚祥”的大小姐身穿童子军服，头戴宽边遮阳帽，肩挎雅致的书包，从西城门里的家中走出来，走过大牌坊，穿过长长的大街，到黉学对面的女子学校去读书。那走路的身姿和目不侧视的神气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放了学，她一进家门，家里的人都会屏声息气，大哥、二哥也不再吵闹。我父亲笑咪咪地跟在她身后，亲自为她冲茶、拿点心。母亲笑着说，看你把她惯成什么样儿！

我家的生意年年看好，县城的时局却一天天变乱。有一天，西城门上竖起一座木头钉成的钟楼。看城门的马三因此变得比过去神气。他敲了钟，全城的商户都要立马关门。——据母亲说那是一种非常生动的景象，一街两行的栅板门乒乒乓乓乱响，小贩们慌慌张张抱起自己的货物和钱褡子没命奔窜。能钻防空洞就钻防空洞，钻不到防空洞的，带上家人往城外跑。跑不掉，就躲进寨河沟或城墙洞。其实城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服从马三的指挥。第一次搞防空演习，马三的钟敲得不很熟练，他用连续的一声长两声短的钟声发出预备信号，商号里的伙计们像做游戏一样觉得很好玩，大多数老板认为这是一出闹剧，联防队的人闲着没事，拿城中百姓寻开心。父亲和母亲只在洋片里看到过那种张着蚱蜢翅膀似的怪物，不相信它真会飞临自己头顶。我父亲张大嘴巴听联防队长向他解释警报信号，显出很听话的样子啊啊地漫应着，觉得不过是应付公差。一声长两声短，表示飞机正朝县城方向飞来，大家做好准备，赶快关门躲避。不歇不停一个劲儿连着敲，是说飞机已经来到，人们要躲好了，别出来。如果它飞到半道拐了弯，或是飞机已经飞走，那就解除警报，当——当——，一下一下，像松了一口气那样懒洋洋的。多少年来，在我的故乡，县城和乡下的学校都使用马三的警报信

号敲钟，用一长两短表示预备，乱点儿表示集合，解除警报的慢长声是下课，上课则用连续的两短。我初到省城的时候，觉得城市里的学生听着电铃作息，上课、下课、集合、开饭、就寝、熄灯，没有任何区别，能听出什么名堂？实在是乱弹琴。

在我出世前的两三年间，县城的人听到过几次认真的警报，也有过一两次飞机飞过县城的惊吓的经历，可我父亲和母亲还没领教过飞机轰炸、扫射的场面。仿佛那些铁蜻蜓不过是吓唬一下城里的百姓，让他们开开眼界罢了。这样的吓唬对一个孩子，远比狼外婆或鬼怪妖魔威慑力强大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看见飞机时的感觉，它经常在我的噩梦里重现。在急促恐怖的钟声和乱哄哄奔跑的人群中，母亲抱着我向城外狂奔。刚跑近一块庄稼地，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呼啸着向我逼近，母亲把我按倒在麦田里，使劲捂着我的耳朵。一个庞大的灰色影子像老鹰扑鸡似的从天空俯冲下来，翅膀擦着庄稼叶子，发出可怕的轰鸣。鲸鱼似的大嘴巴从我头顶掠过，嘴巴周围飘动着黑黑的胡须。翅膀上那块血红的圆团逼着我，麦苗被它扇起的风吹得向一边歪倒。我怕极了，瞪大眼睛看着那个逼近的怪影，绝望地找不到藏身之处。红膏药符号的可怕，深深烙印进我的潜意识，使我多少年来不敢把日本人看做是和我们同样的人类。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一听到飞机的声音，心脏就会缩紧，身体就会颤栗。直到六十年代，飞机的声音仍会使我神经紧张。

对飞机恐惧的条件反射，大约与我在母腹里的经历有关。

民国二十九年春天将尽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，她的血液开始注入我的生命，我在人世间拥有了一个温暖、黑暗的空间。我的生命与城门楼上的警报钟声联系在一起。警报响起一长两短的声音时，城里人用惯常的犹疑不定的态度，把栅板门下入门槽，一扇一扇推进去。那时我们家的房屋还没翻修，临街门面使用着绸缎庄原来的门板。那些木板早已老旧变形，把十六块板依次推进去，让每块板的楔子咬紧，需要耐心和熟练。这件活儿通常由在我家当学徒的堂兄拴去干，他摆弄惯了，不会把门板的次序弄乱，知道哪块板有什么毛病，怎样推才能顺当地进去。可是那天好像出了邪，拴把一块门板斜卡在门槽

里，推也推不进，拉也拉不出。这时城楼上的警报变成当当当的乱响。父亲把拴推过一边说，快跟你二婶出城去！母亲抬起头看看天，然后又看看父亲的脸，“我看不要紧吧？”父亲严厉地挥了一下手，还没说出话来，嗡嗡的声音已经响彻天空。他们从来没听到过那么响的声音，站在门坎边愣了神。跑警报的人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除了躲在商号门廊里的乞丐，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儿。“来的飞机可不少啊。”拴嘟囔着说。父亲跺一下脚说，还不快走！到天主堂去！拴背起我二哥，扯着我大哥，母亲和二姐跟随着，从西城墙绕过内城河，跑向天主堂后门。天主堂墙外挤满了人，他们身体贴紧教堂后墙，仰起头，转动脖颈惊恐地望着天空。教堂钟楼顶悬挂着一面红、白、绿三色旗，惊魂不定的人们提心吊胆地看着它，不知道这面在风中飘动的意大利国旗能不能保佑他们平安？急促的奔走使母亲虚弱、疲惫，她面色苍白，倚在教堂围墙上喘息。父亲还留在家里，他能不能顺利地把那些别扭的门板上好？飞机会不会扔炸弹？……房屋、货物……父亲……？大姐在学校里。女校后边有防空洞。可她很任性，会不会在洞外乱跑？防空洞能不能容下那么多学生？嗡嗡的响声愈来愈大，教堂的围墙，脚下的土地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全都应和着这声音震响。飞机以空前威武的阵势覆盖了县城的天空。拴从围墙影子里伸出脑袋，眯起眼睛盯着天上那些可怕的阴影，嘴里喃喃地数数“……二八、二九、三十……”飞机盘旋得越来越低，堂兄数不准飞机的数目，弄不准它们究竟是三十二还是三十五？他把脖子伸得更长些，打算再数一遍。这时他看见贴着飞机的翅膀掉落一些黑色的东西，像灌满了粮食的布袋，接着是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他以为飞机把炸弹投在了脚边，看见烟雾从西门外升起，才明白教堂周围并没有挨炸。“捂紧耳朵！”母亲大声向她的孩子们喊叫。她弯下腰抚弄着想要大哭的二哥，把他更近地揽在自己腿边。咕咚——咕咚——咕咚——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，内城河的水哗啦哗啦荡起一层一层波浪，火光和烟雾随着每一声巨响冲上天空，房屋倒塌的声音夹杂着竹木燃烧的爆裂声，噼噼啪啪，轰轰作响。

爆炸声和嗡嗡声消失后，教堂墙外的人仿佛都变成又聋又哑的傻子。他们呆愣地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。母亲说她的耳

朵像灌了铅，好像有一只秋蛉爬在脑后扯长声鸣叫，使她的耳膜鼓胀难受。我堂兄拴的嘴巴一张一合，两手在空中比画。我大哥仰起脸扭动着脖子用游移的目光在天上寻找。人们慢慢离开围墙，互相呼唤着向回家的路上走。父亲的身影出现在内城河边的小路上。他急匆匆走到姐姐哥哥身边，把二哥抓起来，举过头顶，让他骑在他的脖子上。在父亲转过身去的那一刻，母亲突然感到一阵晕眩。她手扶墙站了一会儿，心中遮上一片阴翳。她不知道这片阴翳是怎样产生的，父亲拱着他的儿子的背影，使她感到莫名的不安。就是在那一刻，母亲觉察到了我的到来，我使她的心情变得烦躁沉重，从那时起，要不要我这个多余的累赘，就成为母亲没法摆脱的心事。父亲一边走一边急切地和他们说话，好像一家人分别了很久。当他们还沉浸在逃脱劫难的喜悦里没来得及在椅子上坐稳的时候，城门楼上再次响起紧急警报钟声。堂兄迷惑不解地说，它们怎么又来了？还没炸过瘾？刚从防空洞里出来，或是刚从城外回到城里的人们立即又陷入一场骚乱。

三十二架日本飞机一天两次轰炸县城，成为家乡流传久远的故事。它是在母腹里开始人生经历的第一幕。我仿佛亲眼看见那些焦黑的梁檩斜挂在冒着黑烟的断墙残壁上，繁华的码头和热闹的西关变成一片瓦砾。清真寺旁的大树上挂着一截血肉模糊的人腿，零散的肉块和衣服碎片在树枝上当风颤动。老五奶和她的孙子一起进城赶集，刚跑出南阁，一块弹片把她的半边脸削飞。人们围着她的孙子，问他是哪村人。那孩子面色苍白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西关刘表姨刚跑到防空洞旁边，一颗炸弹落下来，六口人只找到四块不完整的尸体。

伴随着使人毛骨悚然的画面，我心里还晃动着一个人穿便衣、腰里挎着驳壳枪的神秘影子。他在我的想象里有时是个长满络腮胡的莽汉；有时是身材细高，面目清秀的军人。稍稍有些弓腰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里透出几分威严。我仿佛看见他带领一支身份不明的队伍，赶着一帮马车，车上覆盖稻草，鼓鼓囊囊满载让人猜疑的货物。在母亲的故事里，他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我。日本人的飞机飞临县城上空，他对年轻的妻子说，你走吧，我和这些东西死在一起了。反正逃跑也得挨枪毙，炸死也是死，不能在这时候装蒜种。他让别人去躲藏，自己一个人

端着枪守护货栈，那里堆放着前线日夜等待的枪支、弹药。准是城里出了汉奸，向日本人通报了消息，他们的飞机才会这么在西关、码头来回轰炸，第一次没炸中，第二次又来。我们的县城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，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，军火总算没受损失，当天晚上在码头装船，沿唐河运往襄阳。

这是个很标准的最终胜利属于我们的故事。我一直确信母亲的故事是真实的，它伴我长大，使我对这位冒死守护军火的刘营长充满向往。在此后的几十年间，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刘营长更多的细节，可是无论在民间传说，还是在能够查找到的资料中，甚至连这故事的蛛丝马迹都未能找到。在不久前新编的县志里，对这件事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，“1940年5月4日（农历三月二十七），日机三十二架在县城西关先后投弹一百余枚，发射机枪子弹数千发，炸死二百多人，伤残一百多人，炸毁房屋七百余间。”好像根本不存在西河码头储放军火这回事。这使我深感失望，虽然它并不能减少我被孕育为生命的过程中的色彩。因为从那天起，我在母腹中就开始了离乡背井的流亡。县城被轰炸后的第二天，日本人逼近县城，三叔赶来一辆大车，把家中的细软和能够带走的货物装在车上，父亲用手推车推着二姐和二哥，母亲带着大姐、大哥，跟随逃难的人群到乡下去。

第三天，日本人占领了县城。

母亲孕育我的十个月内，县城周围发生过五六次激战。小时候我常跟随哥哥到竹林寺西边的抗日烈士陵园去扫墓，那是几次战役中的某一次为县城留下的景观。几级宽阔的台阶走上去，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在两行墨绿的柏树中，碑后有一座很大的圆顶坟冢。我伸长脖颈仰望墓碑上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嘴里喃喃念着“李啥啥，张啥啥，啥啥啥，王家啥……”微风荡过陵园四周的灌木丛，蟋蟀在寂静中鸣叫，我心中充满神圣的遐想。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模样？他们死在我正被母亲孕育的那一年，仿佛和我的生命有某种联系。在我读初中的时候，这地方被平整为学校新扩建的校园。墓碑被扒掉了。北阁街的牛海柱傻唧唧地问我，“这不是烈士墓吗？”我说，“他们已经不是烈士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看着牛海柱的脸，“为什么？瞧瞧这墓碑上是谁题的字？”牛海柱